

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记事

张彦平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

张彦平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

张彦平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4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0478-2/K·95

定价：2.60元

出版说明

延安中央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建立的规模最大、生产时间最长的一所印刷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中央印刷厂克服了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印刷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党的印刷出版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毅同志的名句“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正是对中央印刷厂在内的延安时期新闻出版部门历史功绩的最高评价。

编辑出版《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既是为了保存、积累革命历史资料，又是为了发扬延安精神，搞好“四化”建设。延安中央印刷厂在组织建设、职工教育、生产管理、劳动管理等方面的许多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全厂职工不畏困难，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大胆革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书主要取材于当时的文献、报刊和一百多位知情老同志的回忆，以及作者的采访记录，资料翔实可信。书中所记，凡能判明准确时间的，均按日月顺序编排；无法判明准确时间的，以“本月”、“年内”和“春”、“夏”、“秋”处理。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保留了部分事件发生、发展的情节记叙。

本书出版后，欢迎读者和知情老同志多提宝贵意见。

目 录

1935年	(1)
1936年	(3)
1937年	(5)
1938年	(24)
1939年	(43)
1940年	(58)
1941年	(82)
1942年	(98)
1943年	(124)
1944年	(161)
1945年	(192)
1946年	(199)
1947年	(210)
1948年	(222)

附录

1. 中央印刷厂厂歌.....(223)
2. 《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
资料来源.....(224)

1935年

年初 陕西省苏维埃银行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北川桃园村创办制币工厂，厂名为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金属币制造厂，主要任务是制造银币、铜币以及用木版印刷纸币和布币。前后生产了“中华苏维埃五年制”银币2000枚，陕西省苏维埃银行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券纸币及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五角券纸币等。工厂负责人艾楚南，工作人员有李生忠、薛生义，高光成、刘明成、刘守文等10余人。

4月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金属币制造厂改名为陕西省苏维埃财政部印刷所。

12月3日 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陕西省苏维埃财政部印刷所划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国家银行，直接领导人是财政部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林伯渠。工厂名称遂改为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亦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但习惯上都称印刷所），所长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王行娟著的《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描写了贺子珍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了她在担任印刷所长时的工作情况。书中写道：“贺子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她带着十几个人，白天印钞票，晚上检查印刷的数量和质量，白天晚上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那时，毛泽东也住在瓦窑堡，贺子珍忙得连家也很少回。银行的旁边有几间房屋，

她就在西边的两间屋里住下来。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步行到这里来看她。¹

1936年

年初前后 朱华民、黄秋胜、郭如意（陆松）、郭金水、安玉英（安钦林）等相继调入印刷所。这时，印刷所的主要任务是印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钞票（西北分行行长由林伯渠兼任，副行长曹菊如）。由于当时纸张来源困难，仍以木版印制布币为主。约5月份，贺子珍因临产不能工作，调离印刷所。朱华民^①接任所长。

2月中旬 西北抗日救国会发起筹募抗日基金的运动后，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的全体人员（57人）积极响应，共捐款138.8元。其中捐助最多的有：朱华民25元（获得二等奖章），李生忠、郭如意、高光成、黄亚光等11人各捐5元（获得三等奖章）。在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工作的翁之茂捐了大洋15元。

6月初 钱之光随周恩来、李克农等于4月9日在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后，独自一人到西安采购苏区急需的物资。在东北军的帮助下，从上海买到一台石印机和一些高级纸张。这些东西先由东北军用汽车运送到洛川第六十七军军部，然后于6月初转运到瓦窑堡。印刷所有了第一台石印机。林伯渠高兴地说：“之光，你买回这部印刷机可解决问题呀！以后我们印票子，图案就不会那么模糊了，印起来也就快得多了！”

6月 李长彬^②从红军部队调到印刷所，任石印技工。

7月3日 中共中央由瓦窑堡移驻保安（今志丹县）。

7月初 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迁至保安，在保安城北的一个小村庄继续生产。此后，印刷条件有所改善，共有两台石印机，增加了一些道林纸（胶版纸）。印的钞票比以前好看了，数量也增加了。到离开保安的半年时间里，共印制纸币约有90万元（内含回收陕甘晋银行的部分钞票）。

9月初 印刷所工人慰劳红二、红四方面军，募捐大洋10.45元，袜子一双，衬衣一套，毛巾一条，纸烟六包，肥皂一块，袜底一双。

12月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让出延安、甘泉、合水、庆阳四县。中共中央决定党政机关迁往延安。18日，红军进入延安城。

①朱华民，又名朱子坚，男，江西兴国，1913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印刷厂工作。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初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任所长。1937年，以印刷所为基础扩建为延安中央印刷厂，他先后担任副厂长、中共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职。参与筹建了延安中央印刷厂，并长期主持工厂的日常工作。1940年夏调华北工作。1985年在上海病逝。

②李长彬，男，山东蓬莱人，1914年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初东征作战负伤，伤好后调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一届支部书记。中央印刷厂成立后，历任石印部主任，高家沟口分厂厂长，中央印刷厂副厂长、代理厂长等职，1942年6月调任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

1937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月初 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由保安迁入延安鼓楼北街的一座院落。这时，有二台石印机，30余名工人。

1月某日 祝志澄^①奉命前往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购买印刷设备器材。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陆续招聘了两批共11位包括排字、印刷、刻字、铸字等各工种在内的印刷技术工人。这两批技工中，除个别是由上海抗日救国会介绍的外，其余均是祝志澄以老板的身分，用雇佣的方式招聘的。如，与金文钦签订的合同规定：合同期三年；每月除吃穿外发工资36块大洋；预付三个月的工资等项条款。与蔡善卿签订的合同规定：每月工资32元（管吃住），期限三年；甲方（祝）如提前解雇，要给乙方（蔡）加发三个月工资，并负责送回上海；预付一个月工资等条款。由于环境险恶，这两批技工大部分不知道是到延安去工作，合同中只写明工厂在西安市郊区。祝志澄运用巧妙的工作方法，动员这些技术工人到达延安，使中央印刷厂在创办之初就有了一支强有力的技术队伍，为中央印刷厂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祝志澄还通过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协助，利用各种关系，购买了一批机器设备、印刷器材和各种纸张运回延安。这些设备、器材和原材料保证了中央印刷厂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的困难情况下坚持

生产，其中一些关键材料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1月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着手重建1931年8月成立于江西瑞金、长征时被迫解散的中央印刷厂。筹建工作以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为基础，参与筹建的单位有国民经济部、财政部和陕甘宁特区政府。厂址选定在清凉山。

2月 胡中华（胡杰）从西安到厂，分配在装订部（股）工作。

3月8日 在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北文化日报社负责人宋绮云的安排下，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安晚报社、陕西省印刷局的排字技工党自英、武志善、李广源、李克谦、王吉贵、郑天长（郑天柱），机印技工冯忠信、王石，装订技工刘朝富，刻字技工刘清江，石印技工孙德荣，校对姜梦九等12人，在李蔚然带领下到延安，分配到中央印刷厂工作；同时带来四开平台印刷机一台，脚踏小圆盘印刷机一台及部分铅字、字架等设备器材。中央印刷厂第一次有了铅印技术工人和铅印设备。据承办此事的原西北文化日报社工务科科长郭子刚回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曾亲自向宋绮云交待了一项任务，让他设法搞到一套印刷设备运送延安。宋绮云召集报社部分负责人商议，决定将报社私人集资购买的四开印刷机和圆盘机各一台以及部分铅字、字架等设备器材送交延安。具体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先以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为借口，将设备迁到三原县城；第二步再由三原运往延安。1937年1月中旬，由武志善负责将字架、字盘以及部分铅字、铅材等用马车运往三原；接着，宋绮云与红军驻云阳办事处主任杨尚昆联系安排，由彭加伦带汽车进城接运铅印机及器材。1月30日夜，郭子刚与报社后院隔壁一家住户商妥，由五位工

人拆卸了机器，翻墙通过这家住户秘密装上汽车，运往三原。大约在2月中旬，这批印机在三原装机，以“西北文化日报社三原分社”的名义开始生产，负责人是李蔚然。武志善回忆：在三原时，有一天我们正在赶排《法西斯蒂》一书，李蔚然陪同毛泽民、祝志澄和红军驻三原办事处主任彭加伦来厂参观。几天后，彭加伦又到厂里来，找党自英、刘朝富我们几个人谈话，动员我们到延安去。彭加伦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到了延安，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或厂领导对你们不好，可以直接找毛主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们到了延安，实在不想干，或家里有什么困难，想回西安可随时发给路费再回去。”听了彭加伦的话，我们几个都答应去延安。3月7日上午乘汽车从三原出发，当晚住宜君，3月8日傍晚到达延安。机器设备卸在清凉山对面的河滩上，接着就运上清凉山。3月11日下午，林伯渠和燕子伟在城内南大街机关合作食堂设宴招待了我们。随后，我们便开始进行机器安装等生产准备工作了。

● 月中旬 第一批上海技工顾纪民、金文钦、黄东生^②、赵鹤、贾文龙、蔡川根六人到厂。金文钦回忆：在上海时我曾和祝志澄一起上街购买过部分印刷器材，我负责质量，祝志澄定货、付款。买好后由他运走，运到哪里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西藏中路二层桥旁边的一个茶馆里和他见面，也是在这个茶馆里，祝志澄给了我们车票，安排我们出发。路上由顾纪民负责。到西安后，也是由顾纪民出去联系。订合同时，祝志澄说厂子在西安过去一点点，没有说去延安，我也不知道是去延安。黄东

生回忆：我曾帮助祝志澄把买到的机器设备装箱。机器全是旧的，其中有对开、四开和圆盘印刷机，有铸字机，还有一些铅字和铜模等东西。装箱后由其他人去发运，怎样运的我不知道。从上海动身那天，祝志澄嘱咐，路上一切听从顾纪民的安排。祝志澄没有跟我们一起走，仍暂留在上海。贾文龙回忆：到西安后，顾纪民与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辑宋绮云联系，由他安排我们去延安。按计划先乘马车到三原，在那里住了约五六天，然后换乘汽车到达延安。到延安后，顾纪民去找毛泽民接头，但毛泽民已去新疆，顾纪民又去找林伯渠报到。林老安排我们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由朱华民接待，分配我们的工作。”几天后，林伯渠设宴欢迎上海来的技工。

3月下旬 李平^⑨从三原出发，步行八天到达延安，由中组部介绍到中央印刷厂，分配排字部当学徒。

4月 刘文金（刘文泉）从共青团中央歌舞团调到中央印刷厂，先在装订部，后调铸字部工作，并兼任中央印刷厂团支部书记。

3月 中央印刷厂初具规模，仍归财政部领导，原印刷所成为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股）。

4月某日 中央印刷厂工会成立，有会员40余人，委员长（后改称主任）由朱华民兼。厂工会下设俱乐部，还建立了歌咏队、球队、业余剧团等组织，吸引会员参加政治活动，逐步引导会员习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培养会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荣誉感、使命感。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央印刷厂工会以后十余年间的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厂工会委员会由会员民主选举

产生，委员人数多少，每届不尽相同，但都设有组织、劳保、文教宣传等委员。工会委员的人选，开始由工会自己单独选举产生，1940年5月以后，工会委员与党支部委员重合，即支部的组织、文教委员同时是工会的组织、文教委员等。工会主任除个别时期由党支部书记兼任外，一般则不与党支部书记任职相重，而是直接由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任及委员均不脱产。继朱华民之后担任厂工会委员长（主任）的有赵鹤（1937年）、沈镇衍（1938年初—1938年9月）、周永生（1938年9月—1939年1月）、吴克真（1939年1月—1939年7月）、李平（1939年7月—1940年底）、万启盈（1941年初—1942年3月）、沈洪堂（1942年3月—1942年7月）、万启盈（1942年7月—1943年初）、樊允行（1943年初—1944年）、陆斌（1944年—1945年）、万启盈（1945年）、曹国兴（1946年）等。

4月23日 厂工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议主席报告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拥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重要意义，号召开展一个募捐运动来表示对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拥护，得到全体会员的热烈支持。共募得现洋19.7元，其中捐款最多的有金文钦（王钊）大洋5元，高光成大洋3元。

4月24日 由洛甫（张闻天）任主编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号出版。16开，24页，封面木刻套色印刷。正文有缺字，如丁玲的《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一文中，用“×”代字近100处，并附有油印勘误表一页，错误11处。《解放周刊》1—16期的封面，共有8种版样，都是由廖承志设计的，用木刻版印刷。从第17期开始，改由毛泽东题刊名，仍为木刻版。刘雪苇回忆：《解放周刊》的印数，

开始约在3000至5000册之间，后来可以打纸型浇版了，印数才增加了一些。

4月25日 顾纪民搭乘周恩来的汽车，准备去西安、上海等地采购、接运印刷设备器材，在甘泉县劳山中土匪埋伏，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4月30日 《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拟就。这个草案在工业建设实施方案中强调要“加强中央印刷厂的领导，使其业务有二倍至三倍的增长。”

5月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开幕。中央印刷厂职工热烈拥护，募送绸匾一幅，肥猪一头，并派出代表前往会场庆祝。

同日 《解放周刊》第2期出版。16开，24页，封面木刻套色印刷。第23页刊有一幅木刻漫画（11×8.2cm），封三刊有一幅西班牙形势图（15×14cm）。本期无用符号代字的现象。

5月初 因人员设备增加，清凉山的房屋不敷使用，中央印刷厂迁往城内鼓楼北街原厂址。

5月上旬 沈镇衍、时长耕（史纳）、周永生、蔡善卿、孙梅生第二批上海技工到厂。从上海动身时，祝志澄送他们到火车站，指定由沈镇衍、周永生负责。嘱咐到西安后住什么旅馆，并给西安红军办事处写了介绍信，要他们找叶剑英联系。祝志澄仍暂留上海。时长耕回忆：“在上海时，通过抗日救国会的介绍，我们认识了祝志澄，他前后两次到我和沈镇衍的宿舍来考察、谈话。当时谈定每月工资18元，先发一月工资。沈镇衍事先可能知道要去延安，我不知道。祝志澄让我们走之前按他的通知在永安公司天桥旁的露天场

会面，并规定了联络暗号。我、沈镇衍、周永生接通知去接头后，祝志澄告诉了动身时间，由他买好车票，送我们上车。他交待说，如在西安遇到检查，就说是到西安某日报馆来工作，并可以打电话找某人作保。到西安后，沈镇衍、周永生两人去找叶剑英联系，叶恰好不在，来了一位参谋安排我们的行动。第二天从西安出发，在三原、宜君各住了一晚，三天到达延安。我们在西安时看到《解放周刊》第2期，到延安正赶上排第三期。”

5月11日 《解放周刊》第3期出版。28页，封面单色印刷。文艺栏莫休的《枪桥》一文中，仍有用符号代字数十处。

5月24日 《解放周刊》第4期出版。27页，封面单色印刷。从这一期开始，以后再没有出现用符号代字的现象。

5月28日 国民经济部《一年半来国民经济工作的总结报告》在总结过去的工作成绩时说，国民经济部从1937年1月至5月，“筹办了大规模的铅印厂一处，现已开工。”并计划今后“扩大印刷和纸厂生产量。”

5月31日 《解放周刊》第5期出版。28页，封面套色印刷。第17页刊登一幅木刻漫画（7×12cm）。

5月 祝志澄在上海购买的设备器材陆续经西安运到延安，中央印刷厂的设备已经比较齐全。从本月起，中央印刷厂划归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直接领导人是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廖承志。此后，中央印刷厂的隶属关系虽仍有变更，但一直是中央宣传部门管理的工厂。工厂的名称，筹建时仍沿用印刷所旧称，3月改称印刷厂，6月公开称中央印刷厂。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底，改称陕

甘宁边区印刷厂；1941年以后，又复称中央印刷厂。

祝志澄厂长本月返回延安。祝离厂外出期间主持工厂工作的副厂长朱华民到排字部排字，仍为不脱产的副厂长。中央印刷厂历任厂长、副厂长是：——1937年1月至1940年3月，厂长祝志澄，副厂长朱华民（至1940年夏）。

1940年3月，李长彬升任副厂长。同月，祝志澄前往重庆购买印刷材料，返回延安后，接任解放日报社副秘书长兼经理，因此，从1940年夏到1942年3月由李长彬代理厂长。李长彬调离后，祝志澄继续担任厂长。1942年4月，杜延庆升任副厂长。1946年1月，祝志澄调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万启盈接任厂长，直至1948年3月中央印刷厂结束。1946年2月，杜延庆调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雷达天接任副厂长（至1947年10月）。1946年10月，黄东生升任副厂长。1947年3月，黄东生率队随廖承志东渡黄河，惠泽民接任副厂长（至1948年3月中央印刷厂结束）。中央印刷厂党组织的沿革隶属变化较大。1937年10月以前，单独设立党支部；同年10月第二次迁上清凉山，与解放社、新华社等共同组成一个党支部（习惯上仍叫中央印刷厂支部）。1939年9月以后，中央印刷厂党支部隶属于中央出版发行部党总支，1941年12月，改属中央出版局党总支。1945年9月以后，中央印刷厂单独成立党总支，隶属中直党委，下设三个支部（厂部一个、生产部门两个）。1947年3月自卫战争开始，工厂编为战时体制，同年11月复厂后仍为党支部，直到中央印刷厂结束。先后担任中央印刷厂支部、总支书记的有：朱华民（1937年）、李长彬（1937年）、王均宇（约1937年10月—1938年5月）、王养三（约1938年5月—1938年12月）、